

冯天瑜
主编

转型闻学人评传书系

迎来近代剧变的经世学人

魏源与冯桂芬

李少军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转 型 间 学 人 评 传 书 系

冯天瑜 主编

迎来近代剧变的经世学人 **魏源与冯桂芬**

李少军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迎来近代剧变的经世学人:魏源与冯桂芬/李少军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转型间学人评传书系/冯天瑜主编)
ISBN 7-5351-2654-5

I. 迎… II. 李… III. ①魏源(1794~1857)—评传
②冯桂芬—评传 IV. B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75612号

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	武汉市青年路277号
发行:	邮编:430015 电话:83625580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湖北开元印刷有限公司	(437100·咸宁市温泉路41号)
开本:850mm×1168mm 1/32	5插页 11印张
版次: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264千字	印数:1-2 000
ISBN 7-5351-2654-5/K·78	定价:20.00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总 序

冯天瑜

历史的演进，多数时段是在同一社会型范内部运行的，但当各种内外条件细缛积淀，达到某种临界点时，整个社会固有的动力定型便发生突破性变更，正如液态水加温到摄氏 100 度时即转化为气态水一样。纵观人类历史，曾发生过几次大的社会转型，如从蒙昧时代向野蛮时代转型（核心内容是采集—渔猎经济向农业—畜牧经济变换），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型（标志是金属工具和文字的使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人类自觉意识的提升和改造外在世界能力的增强，社会变迁赢得了加速度。如果说，前述两次转型的完成，历时数以千年计，那么，在文明时代，某些社会转型往往经数百年便大体完成。以中国历史而论，先秦之际的两三百年间，曾发生从领主制社会向地主制社会转变，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体制乃至观念形态均有大更革，清初顾炎武之序战国时期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是颇富历史感的概括；此后发生的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更革、唐宋之际的社会更革、明清之际的社会更革，均在百十年间实现。与这些社会更革相互推引，其间人们展开了风姿卓异的精神创造活动，构成中华文化史上璀璨夺目的篇章。

若就社会变迁的深刻程度而言，可与前述蒙昧时代走向野蛮时代，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这两次大的社会转型相类比的，则是

发生在近几个世纪的现代转型。在长达数千年的文明时代的前期和中期发生的种种社会异动,大体都是在农业—宗法社会内部的局部变迁,而近几个世纪渐次扩及整个世界的现代转型,则是一种全局性的社会质变,其变化的广阔度和深刻度,均不可同日而语。

二

近几个世纪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现代转型,基础性内涵是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转化,其显著标志是,有机动力系统(人力、畜力)为无机动力系统(矿物燃料、水力、核能)所接替,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作,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由驯化利用天然原料为主,变为加工改造天然原料为主,“顺应自然”演为“征服自然”,“高效率”和“标准化”成为经济生活的准则。与物质文化层面的巨变相表里,在制度文化层面,彼此隔绝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静态乡村式社会,转化为日益开放的、被种种资讯手段紧密联系起来的动态城市式社会,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变为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礼俗社会变为法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枢纽由身份演为契约,宗法—专制政体为民主—法制政体所取代。作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转型的精神先导和思想反映的观念文化,也在这一过程发生深刻的变异,诸如神本转向人本,信仰转向理性,宗教转向科学,教育从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变为大众共享。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型过程所必须完成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则分别由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知识分子的形成为壮大而逐步得以实现。

上述是就现代转型的世界通义而言的。这种现代化的通约性,在物质文化层面表现明显,而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层面,通约性固然无庸忽略,但民族特殊性也各展丰姿。

三

以世界之大,各地区、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颇不平衡。就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而论,是以14—16世纪南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世界性远航开其端绪的,此间勃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为其文化标志,学人代表则有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文化巨匠;这一转型的富于力度的展开,则是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继起的法国政治大革命,其文化标志为启蒙运动,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洛克、哥德是启蒙时代的学人翘楚。成长于西欧的工业文明伴随殖民扩张又延至北美,进而波及全球。世界历史以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契机,从分散走向整体,五洲四海的人类无论自愿还是被动,均渐次汇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大潮之中。

对于西欧而言,发端于14世纪,正式展开于18—19世纪的现代转型是从中世纪的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可以称之“内发内生型”。对于西欧以外所有其他地区而言,现代化过程虽然各有不同程度的内在动因,却都是在世界历史已经走向整体化之际逐步实现的,也即在西欧现代文明强有力的影响与示范之下得以发生,因而其现代化可以称之“外发次生型”。

西欧以外地区的“外发次生型”现代转型,又大略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欧洲殖民者入侵之际,土著文化十分落后,如北美洲和澳洲,欧洲人前来殖民时,当地人尚处在新石器时代,欧洲近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连同人口,全盘迁徙而来,因此,北美洲(美国和加拿大)、澳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现代文化是西欧模式的整体移植,也可以说是“全盘欧化”,那里出现“新英格兰”、“新威尔士”、“新奥尔良”等地名,正是欧洲文明整体移植的表征。另一种类别是,当地早已形成悠久深厚的文明传统,如埃及、波斯、印度、中国、日本,都有数以千年计的文明史,欧洲近代文明来袭之际,这些国度虽然尚滞留在“前近代”,却不同程度地拥有与

外来的欧洲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国度的现代化，并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吸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这类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全盘欧化”，而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化合反应，就当地人而言，既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转换，也要实现文化的民族性因革。这两者间虽包藏着统一的内蕴，却往往在相当长时段呈现相互矛盾、彼此抵牾的外观。而作为这些地区文化重建任务担当者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即本丛书所称的“学人”）特别敏锐、深切地感受着并且反映着这种矛盾性。

四

近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是19世纪中叶以降“古今中西”文化交会的产物。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19世纪末叶方开始出现，20世纪则艰难曲折地成长。由于内外条件的制约，中国的中产阶级底蕴不足，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经济上、政治上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宗法一专制势力的依附屈从，而且，因为中国历来缺乏市民政治独立、文化自主的传统，故而中国中产阶级在精神上患有先天软骨病，既无力量，也无胆略充分担当起社会重建使命，于是，这一日渐紧迫的任务连同文化重建任务，一并落到同样发育并不充分的知识分子肩上。而中国知识分子则义不容辞地一身二任焉，这除了客观条件所使然（如中产阶级未能充分担负分内责任）之外，更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渊源与特色大有干系。

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是春秋战国以来延绵两千余年的士大夫。作为现代社会和新的世界背景的产物，身着西服（或中山装或毛式服装）的知识分子在时代意识、知识结构、角色认同等方面均与长衫博带的士大夫颇相径庭，特别是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基本摆脱了君统与道统的双重负担，不再以“忠君事亲”、“代圣贤立言”为行事作文基准，其生活路径也大体走出了“学

优登仕”的故辙。然而，中国知识分子虽脱下士大夫的长袍，但在精神上却承袭着士大夫的某些传统特质。以本丛书涉及到的诸学人为例，大多有直接的士子经历，且不论魏源、冯桂芬辈均有功名，并曾入大吏幕府，或一度执掌州县，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梁启超是前清举人并出入宫廷及大吏门墙，即如鲁迅、陈独秀，也都有“三味书屋”式的传统教育背景。他们大体都是从士大夫走向知识分子的过渡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保有传统士子心态是情理之中事。

秦汉以降，中国的社会阶层序列是“士农工商”，与商人自陪末座相对应，士人历来居四民之首，不仅自视国家栋梁，也被社会认作人中精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孟子·告子下》），便是士子豪迈情怀的写照。在认知层面，士人以“求道”、“闻道”、“弘道”为旨趣，以先觉觉后觉、先知觉后知为使命；在政治层面，士人以“平治天下”为目标，但这一目标往往要在依附君权的情形下才能得以实现，由此造成士人“忠君”、“事君”特性；士子又秉承先秦以降的“民本”传统，有着“亲民”、“为民”倾向，故常在“尊君”与“重民”间徘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是他们二重心态的流露。汉代的选举制，尤其是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将士人的治世追求变为活生生的制度性现实，也将士人与君权维系在一起。总之，无论是士人的自命，还是社会的期盼，士人都扮演着“精神导师”与“官僚后备队”的双重角色。19世纪中后叶以降，中国传统社会格局崩解和重组，但从士大夫转变而成的知识分子虽有日益“边缘化”的趋向，多已走出“忠君”、“事君”故辙，却并未忘却“平治天下”的使命和充当大众精神导师的任务，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知识分子和西方中产阶级分别担当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一肩挑起的历史因由。李大钊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正将中国现代学人的双重使命感精要地表述出来。

五

中国近现代社会处于古今更替、中西交会的大转折时期，具有过渡性时代的全部复杂性。这种过渡时代向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提出的使命，不仅有文化的古今转换，还得面对文化上的民族性传承问题。而中国近现代学人大都在少年时代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多有深厚的家学渊源，青年时代又沐浴欧风美雨，不少人曾留学东西洋，其知识结构兼有“子曰诗云”的中学和涉及声光化电、艺文哲思的西学，成为时代性上的“古今过渡人”和民族性上的“中西边缘人”，其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和情感系统呈现多重性，其社会实践（包括学术实践）更异彩纷呈。转型间的中国学人，有的坚守民族文化本位，却又吸纳了西学的某些成分（如梁漱溟、熊十力）；有的呼唤“全盘西化”或“全盘世界化”，却实则植根本土文化（如胡适）；有的早年力倡西学，晚年又回归东方文化（如严复、梁启超）。而这批转型间的学人都有深刻的传统文化情结，即使那些激烈倾向西化的学人，实则理智向着西方，情感却执著于东方。这些都是过渡时代文化二重性的表现。

自 19 世纪中后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迭兴之际，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数次文化论战，中西体用问题一直是热门话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常用语，而批评此说的论者也言之滔滔，自成理路。这正是国人为着求得文化二重性矛盾解决方案所作的努力。时至 20 世纪末叶，改革开放大潮涌动，文化讨论再度兴起，中西体用之辨仍然是一大题目，在“中体西用”说之外更出现“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诸说。有人认为这种旧题重说表现了文化讨论的缺乏新意，我却以为这一回环现象正显示着文化二重性矛盾继续困扰着当下国人，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对此无可规避。仅仅在这一意义上，反顾并总结本丛书诸传主的心路历程和思维教训，也是大有益处的。

六

转型间中国现代学人各有专业领域,其中一些人在其学术天地足以同古哲媲美,与国际同行并驾齐驱,堪称富于创识的文化大师级人物,他们在文化重建方面的贡献,令人景仰。本丛书传主中王国维之于史学与文学、鲁迅之于文学、胡适之于学术多种门类的建树,均可谓丰碑。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学人作为士大夫传人和现时代的精神导师,又身怀“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抱道忤时”的忧患意识,不少人还保有“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与政治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性。有些人(如王国维)虽远离政治,却以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托命者自况,怀抱高远,绝无降格为技艺之士的意向。由于这些品格的作用力,加之客观环境的挤兑,如内忧外患的中国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以致相当比例的中国学人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不是走进书斋、实验室潜心于文化建设,而是以文化人和社会良知体现者的双重角色,投身民族救亡、社会变革、大众启蒙。低吟“布衣老大伤怀抱,忧国无端有叹声”(《梁星海编修免官寄赠》)的康有为,虽也有构筑庞大思想体系的努力,但有欠精当,他的闪光处却在鼓动变法,导演“百日维新”的悲壮剧;康氏弟子谭嗣同则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雄精神”,献身菜市口,演出戊戌变法最惨烈的一幕;人们纪念于此,显然远过于对谭氏颇有拼凑感的《仁学》一书的关注。至于以“革命军中马前卒”自命的邹容、蹈海自尽以警醒国人的陈天华,所著之《革命军》、《狮子吼》、《猛回头》、《警世钟》等,其革命鼓动功能大大超迈其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蔡元培的美学论著虽不乏会通中西的努力,但毕竟有欠深刻周详,他的伟绩乃在以民主精神、“兼容并包”气度创办中国新文化的摇篮——北京大学。新文学的代表作家鲁迅,青年时代即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他的白话小说文学价值不朽,但他创作此类篇章意在“为社会”、“为人生”,而并无意挤进“纯文学”的殿堂。

总之，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本丛书传主多处在此阶段），中国学人虽然也致力于文化重建，在这方面功不可没，我们今日从事的文化工作必须以他们的先期努力为基础，但本丛书传主们作为那一时代最活跃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往往直接投身于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之中，成为活动家及领袖人物，或者响应革命前驱的“将令”，使自己从事的文化工作隶属社会改革，成为其工具与武器。纯粹学科意义上的文化重建，当时常被视作不急之务，少数潜心于学科建设的文化匠师（如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长期被社会所冷待，然而，他们的默默耕耘，实乃转型期文化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时间的推进，其价值日渐彰显。本丛书兼收这两类学人，其意在全面反映转型期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风貌，并显现其各自的价值。

七

本丛书的各位执笔均是中青年人文学者，对传主有相当研究，而作为新一轮古今中西文化交会的亲历者，他们对转型时代自有新的体验，这正是对前辈学人心路历程能够得以理解并进行诠释的现实基础。

本丛书的总体设计是否略有创意，各篇的具体展开是否精当，在众多的近世学人传记中，本丛书是否有特别的存在意义？对于这些，实在没有把握，尚待读者诸君阅后评判。

1998年4月上旬构思于武汉大学
4月下旬成文于日本爱知大学名古屋校舍

目 录

总序/冯天瑜	1
一 湖湘英才 江南翘楚	1
二 经世致用 身体力行	20
1. 晚清经世派抬头	20
2. 魏源、冯桂芬与经世派	31
3. “贯经术、政事、文章为一体” ...	40
三 蒿目时艰 竭虑除弊	53
1. 竭虑除弊	54
(1) 漕政改革之谋划	55
(2) 盐政改革之促进	69
(3) 治水问题之研究	77
2. 除弊主张所反映的魏、冯思想动向	88
3. 在农民大起义面前	104
四 遭逢奇变 矢志御侮	122
1. 鸦片祸水引起的忧思	123
2. 鸦片战争中的魏源与冯桂芬	131
(1) 魏源与鸦片战争	131
(2) 冯桂芬与鸦片战争	164
3. 总结鸦片战争 坚定抗敌之志 ...	170
(1) 魏源论鸦片战争的原因	173

目 录

(2) 魏源看中国失败的原因	185
(3) 冯桂芬的见解	208
五 创榛辟莽 追求富强	213
1. 推动国人开眼看世界	213
(1) 批判清朝对外深闭固拒、茫然不知外情	214
(2) “立译馆、翻夷书”的主张	217
(3) 魏源《海国图志》之编纂	223
(4) 冯桂芬对中国所处地位的认识	237
2. 对“富国强兵”的追求	240
(1) “富国强兵”与“自强”目标的提出	240
(2) “师夷长技以制夷”	243
(3) “强兵”的其他必要条件	254
(4) 关于“富国”问题的思考	259
3. 为“富国强兵”而谋求改良政治	268
六 声播域外 东瀛回响	283
1. 《圣武记》与《海国图志》之域外传 播	284
2. 比较中的审视	296
(1) 魏源、冯桂芬与横井小楠比较的理由	298
(2) 对外观之比较	301
(3) 富国强兵思想之比较	310
(4) 政治改革思想之比较	322
写在最后	328
附录一 主要著述目录	335
附录二 主要参考资料	336

一 湖湘英才 江南翘楚

翻开明清以来中国文化史册，从王夫之、顾炎武和黄宗羲等早期启蒙思想家开始，湖南、江浙籍大师巨匠不胜屈指，本书的主人公魏源与冯桂芬，就是其中的杰出人物。他们是中国历史大转折时期涌现的湖湘英才、江南翘楚，以开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端绪，而奠定了其在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人们谈论历史人物，往往先从时代背景说起，认为时势造英雄，纵使怎样的豪杰逸才，总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做时代要求做并且允许做的事情。这自是不错的。但似乎还可以反过来考虑，为何在同样的时代背景、条件下，有人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有人却平平庸庸，碌碌无为；有人能随潮流前进，有人却落伍甚至逆流而动？实际上，历史人物的禀赋、才具、性格与特殊的境遇等等，对于其功业成就的取得，重要性并不亚于他置身其间的时代背景和条件。古人治史，向来强调“知人论世”，以“知人”为先，确有道理。因此，现在我们谈论魏源与冯桂芬这两位重要历史人物，也应先知其人，循着他们的人生轨迹，了解其禀赋、才具、性格与境遇。

魏源，又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1794年4月23日（清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生，1857年3月26日（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卒；冯桂芬，字林一，又字景庭，1809年？月？日（嘉庆十四年？月？日）生，1874年5月28日（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卒。两人年龄相差15岁，享年则大致相当，魏源63岁，

冯桂芬 65 岁。

魏源的家乡在今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金潭，其地在长沙西南约 300 公里，群山环抱，属于资江流域。虽然山清水秀，当时却偏僻不便，迄今也只有公路和水路通往山外世界。魏源的先祖本在江西吉安，元末迁至湖南。到魏源出生时，魏氏一族在金潭已生息三百多年，故魏源完全是一个湖南人。金潭僻在山中，最常见的图景是男耕女织，一派田园风光。但这里也决不是像《桃花源记》所描写的那种与外界隔绝的天地，商品交换借助崎岖的山路和蜿蜒的资江，把触角伸到了这里，也浸润了魏源家族。一本有关魏源的传记，根据未刊《邵阳金潭魏氏族谱》叙述说：魏源的曾祖“除收租外，并服贾经商，财源称意”；祖父“承其家业，家颇饶裕”，以至于能修万石谷仓，只是到魏源幼年时，才家道中落。^①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学优登仕是人们共同的价值取向，故魏源家族在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并不想世为农、商，而崇尚、追求读书仕进，力图走出金潭山村、进入社会上层。魏源的父亲魏邦鲁，即为此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他是一个监生，“好读书，喜游览，所至交其豪杰”。^②在嘉庆初年，通过捐纳得巡检一职，从此长期在江苏充当小官吏，直至 1810 年死于宝山主簿任上，还留下遗嘱“可留家于吴”。^③魏邦鲁之弟辅邦，中秀才，曾肄业长沙岳麓书院，本人虽最终留在家乡，但却把登龙门的希望寄在后辈身上，“课子侄及孙辈甚严，必延访名师，不惜重聘，礼貌特隆。每日除塾师功课外，口讲指画，彻夜不休”。^④魏源出生时，据说其母梦见一个身着古衣冠的人“持巨笔及金色花授之”，说这是为

① 李汉武：《魏源传》，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3 页。

② 《宝庆府志》卷 128。

③ 同上。

④ 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 年版，第 10 页。

她儿子准备的，^①足见魏家望子成龙之切。

至于冯桂芬的家乡，是在江苏吴县，属苏州府，处于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腹心，周围有名山巨泽包涵环匝，四通八达，“所辖金阊内外，比屋连甍，通衢带阊，万商之渊，駉駉乎甲通省”，^②是清代屈指可数的纤丽星繁的商业城市。冯桂芬的先祖本在湖南，后迁徙到江苏常熟，明朝弘治年间再迁至苏州，“筑宰郡城外山塘东北浚小港，曰冯家浜”。^③到冯桂芬出生，其家族定居苏州已历五代，且累世多以经商谋生，直到冯桂芬的父亲冯智懋幼年时，也还因族中“有肆业”而“家不贫”。^④不过，冯智懋8岁丧父，母子数人没有从族中分得多少财产，因而生计变得颇为艰难，他不得已只好从14岁起赴松江学做生意，10年后才返回苏州，并“渐以贸转至小康”。^⑤在当时的苏州，像冯家这样谋生，实在是既平常又正常。并且，冯家也兼有当时商家的一般特性，即不愿脱离田地的依托，而将商、农并举作为理想状态。冯智懋“平日锐意欲建祠置田，颇有规画，终以力未逮而辍”。^⑥冯家所在的江苏吴郡，同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荟萃之区，所谓“清淑灵秀之气磅礴郁积，蔚为人文渊薮”，^⑦“汉晋以来，代有闻人，声明文物，照耀江左”，在截至19世纪中叶的清代二百多年中，“登大魁者，一郡至二十余人，科第之盛，甲于海内”。^⑧在这样的氛围下，这里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与邵阳隆回金滩那样的偏僻山区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金榜题名仍然是最为风光、最可自豪

① 《魏源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7页。

② 《重修吴县志记》，《显志堂稿》卷3，第2页。

③ 《诰封宜人先慈谢宜人事状》，《显志堂稿》卷8，第24页。

④ 《春圃府君行述》，《显志堂稿》卷8，第29、24页。

⑤ 《春圃府君行述》，《显志堂稿》卷8，第30页。

⑥ 《诰封宜人先慈谢宜人事状》，《显志堂稿》卷8，第23页。

⑦ 《显志堂稿》卷首，吴云序。

⑧ 《苏州试院记》，《显志堂稿》卷3，第10页。

的事情。冯家也不例外。冯智懋“少孤辍读，终身以为憾，又以近支无业儒进取者，故督不孝（即冯桂芬）读书甚严，而于敦品励学，训之尤详”。^①冯桂芬得中秀才后，其母大喜，曰：“汝家自汝高伯祖……曾伯祖……后，无读书成秀才者，今汝继之，甚善。愿世世为秀才不绝，其荣多矣”。^②

考察魏源与冯桂芬的籍贯与家世，不难发现：除了地有湖南江苏之别、乡村城镇之分外，更多的还是相似乃至相同点。他们的先辈都有从商的经历，同时又没有离开或者向往重返田园；他们从小就受到同样的价值取向熏染和驱动。

拿一般中国人家衡量儿孙的尺度来看，少年时代的魏源与冯桂芬都属于标准的好孩子，因为他们从稍懂事起，便自觉地朝着长辈所希望的方向不懈地努力，并且显露出超群的才华。据魏源之子魏耆记述：魏源从七八岁起入家塾，忘我读书，心无旁骛，极少出门，以至于偶一外出，便引来一片狗叫声。夜晚依然手不释卷，咿唔达旦，致使父母非常担心他的身体，“每夜定，灭灯令卧”，可他还是“伺二老熟寐，潜篝灯被底翻阅”。^③如此刻苦好学，实非一般同龄孩子所能及。不仅如此，少年魏源的聪慧，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般孩子只能机械地背诵的古书，他听讲之后即解大意；九岁到县城应童子试时，县令指着茶瓯中所绘太极图曰：“杯中含太极”，怀揣着两个麦饼的魏源灵机一动，当即以“腹内孕乾坤”答对，对仗之工整，意境之高远，不能不使县令大为惊异。^④较之于魏源，少年冯桂芬似乎更多地保持着孩童的天性，父母不在跟前时还是喜欢玩耍，但终究行不逾矩，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父母“敦品励学”之训，渐去所谓“粗浮”气性，发愤

① 《春圃府君行述》，《显志堂稿》卷8，第34页。

② 《诰封宜人先慈谢宜人墓志》，《显志堂稿》卷8，第26页。

③ 《魏源集》下，第947页。

④ 《魏源集》下，第947页。